第19卷 第1期　　昆 虫 学 报　　Vol. 19, No. 1
1976 年 2 月　　ACTA ENTOMOLOGICA SINICA　　February, 1976

与群众结合　为农业服务

上海昆虫研究所

我们所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没落阶级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批判了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全所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革命的大好形势促进了科研的不断发展。全所先后完成架空通讯电缆防木蜂研究，铁道材料防白蚁研究，“灭蚁灵”灭治家白蚁试验，人工饲料饲养三化螟，中华按蚊室内常年饲养的研究，桑毛虫核型多角体病毒的分离、鉴定和防治试验，人工合成红铃虫性引诱剂，以及常用农药残留量分析、氧乐果的合成和防治抗药性棉蚜大田效果考核等一批科研成果。其中有些已经推广应用，受到广大工农兵的欢迎。这些成果的取得，关键在于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科学研究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用毛泽东思想教育科技人员，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三结合”开门研究，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

一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科研路线的正确与否，归根到底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首先组织广大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教导，以及“**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讨论，批判轻视农业的种种错误思想。

其次，总结历史经验，进行路线分析。早在1958年，在总路线指引下，所里许多科技人员遵照毛主席教导到工农群众中去，同群众一起研究害虫防治。在与柑桔爆皮虫(一种柑桔树毁灭性害虫)作斗争中，土洋结合，一年就摸索出大面积防治爆皮虫的新方法，并很快得到推广应用，受到了贫下中农的欢迎。但是，1962年以后，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有些科技人员认为研究所的重点应该放在基础学科方面。不愿承担与农业有关的害虫防治工作，还有人说：“我们是科学院，不是农科院；是研究所，不是防治所”，“搞防治出不了理论”，贬低大跃进的科研成果。使大批科技人员又回到实验室，走进了关门研究的死胡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科技人员在工人宣传队带领下，下乡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治虫战斗，进行调查研究，重视农业生产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虫害问题，实行开门办所，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同时也促进了科技人员自身的思想革命化。但1972年，在社会上一股右倾思潮的影响下，又出现了一些思想波动，表现了昆虫研究工作中有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大家从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深刻分析中，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路线不正，方向不明；路线搞对头，支农有劲头”。

我们还几次组织干部和科技人员到生产第一线参加农业劳动。在劳动中，有一位老贫农扫起一簸箕棉花红铃虫问我们：“这些红铃虫个个吃得又肥又胖，是我们贫下中农的

死对头。你们研究昆虫的,有什么办法对付呢?"贫下中农这席话,对科技人员震动很大,使原来建议"按学科建室"的同志亮出了私心:怕强调了为农业服务,天天在农村搞防治,成不了专家。大家一致表示决心说:"我们搞昆虫研究,首要任务是同农业害虫作斗争。这是贫下中农的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需要。如果把贫下中农的要求丢在一边,而去关门搞研究,实际上是要回到'三脱离'的老路上去,这决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个人成名成家的资本主义道路"。

在思想认识提高的基础上,我们确定把粮棉主要害虫作为主攻对象,同时对有关卫生、建筑方面害虫研究也安排一定的力量,使全所科研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

二

摆正了昆虫研究为农业服务的大方向,紧接着就要解决依靠什么人、走什么道路,建立一支什么样科技队伍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有的研究人员曾经认为:成果推广靠群众,科学研究靠自己。搞研究工作,开头还可以与工农群众商量,进一步提高就要靠自己了,靠群众就不行了,还说什么:"龙眼识珍珠,牛眼识稻草,各有各的用处"。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下"点"实际也是"蜻蜓点水",不解决问题。有的野外工作点不过是实验室搬家,地点转移,做法照旧。贫下中农很气愤,曾批评说:"高统套鞋穿到膝馒头,摇摇晃晃走到田横头,东一看,西一望,勿晓得搞点啥花头。"在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批判了"关门研究"、下乡"蜻蜓点水"、"上智下愚"等一套修正主义观点和做法,确定了开门办所,下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一些正确做法,使广大科技人员的路线觉悟有了提高,自动到生产第一线与工农实行"三结合",一起搞科研。我所有一位研究人员,过去人家来信称他"专家",内心很高兴。近几年他的思想起了变化,主动要求走出去,开展白蚁防治研究,为通讯电缆的防白蚁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受到工农群众的欢迎。前后对比,他作了自我解剖,沉痛地说:"过去听到那里有白蚁为害,自己想的与众不同,首先不是考虑怎样来防治,而只想将它采集回来看看是属哪种白蚁。群众做的是灭蚁战斗,我则只是关在小房间分分虫子;群众想的是治虫保产,我只想写稿争名;群众为的是国家集体,我则为个人争利。这决不是什么工作方法问题,而是立场、态度问题"。寄生蜂组自1970年以来,能坚持"三结合"搞科研,贫下中农赞扬说:"以前你们穿着白大挂离我们太远,现在一起搞科学实验,是我们的贴心人"。

但是,知识分子同工农相结合,开门办所,这是一个斗争过程,必然有反复,需要不断实践,不断前进。有这样一件事:灭蚊组个别科技人员不相信贫下中农试验的稻田灭蚊好办法,说什么"水稻水稻,有稻必有水,有水就有蚊虫孳生,稻田孑孓是难以控制的。"因此也不愿到现场去了解实际情况。在批林批孔中,到现场学习了贫下中农稻田灭蚊的经验。认识提高以后,他们就走出去,坚持与贫下中农一起搞稻田灭蚊扩大试验,观察蚊虫活动规律,用自己身体作叮咬频率的观察,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

实践证明,工农兵是科学技术的主人,科学研究只有与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相结合,不断总结群众科学实验的经验,才能多快好省,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主导思想问题,也是普及推广科研成果和提高科研水平的重要途径。为此,我所采取了三种形式:一,下乡

蹲点。在农村建立比较固定的研究基点，在当地党组织统一领导下，根据农业生产的丰产、保产需要，承担一定的害虫防治任务。二，现场试验。当必须在实验室进行的准备工作搞到一定程度，就走出实验室，同群众结合进行现场试验。三，组织临时小分队。根据发生的虫情和有关部门的统一部署，参加短期突击任务或开展重点调查研究。

三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在科学实验方面，敢不敢闯，敢不敢创？这是能不能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到发展新技术，探索新途径上去，发挥出巨大威力的一个重要问题。1973 年初，在讨论要不要开展昆虫病毒治虫研究时，有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我们昆虫所一无微生物专业人员，二无这方面技术条件，不容易搞；另一种则认为病毒治虫既然是个新途径，我们就要闯，没有专业知识可以边干边学，没有条件可以因陋就简，表示要"敢"字当头闯出个新路子来。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组织科技人员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以及"**从战争学习战争**"等教导，武装思想，鼓舞斗志，看清方向。通过分析，大家认为相生相克是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现象，既然昆虫会有一定的病原体在抑制着它们的非常旺盛的繁殖力，那么就一定能寻找出昆虫致病的病毒体。正当这时，川沙县高桥公社贫下中农在防治桑毛虫实践中，发现了大批桑毛虫自然病死尸体，我们就组织科技人员到现场去搞科学实验。经过不到半年时间的共同努力，完成了桑毛虫核型多角体病毒鉴定、分离研究，并用这种病毒防治桑毛虫，大田防治效果可达百分之八十左右，而且对人畜、家蚕无害。这就为进一步开展病毒治虫的研究打开了门路。科技人员说：桑毛虫病毒研究的上马，充分反映了"一想二干三成功"，不象过去"一要二等三落空"。要是没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敢于闯新的精神，今天也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

在科技方面敢不敢创新，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还是跟在洋人后面爬行，这也是科学技术领域中两种思想激烈斗争的具体表现。文化大革命前，我所有一些科技人员也搞理论研究，但基本上是照抄照搬洋人一套，碰到困难时，看看国外还没有成功，觉得可以慢慢来，或者就宣布暂告一个段落，等到国外有了发展再学着摸。结果赶超便成为一句空话。而另一种态度是敢于创新，敢于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为祖国科学事业作出新的贡献。我所人工饲料饲养三化螟的经过是个例证。三化螟是我国危害水稻的主要害虫，要提高现有的防治水平，需要进行各方面生物学研究，但是大量的实验材料来源是个老大难问题，国内外虽有人进行研究，可是均未获得成功。我所 1963 年曾上马开展饲养试验，但受洋奴思想的影响，看到国外没有成功的报道就以为困难很大，结果搞了两年，幼虫只能活二十九天，试验就此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科技人员深入农村，提出要求开展饲养研究。并用毛主席关于"**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也要有**"的教导，决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同时在整个研究中，树立实践第一的观点，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经过三年多的反复实践，终于用人工饲料饲养三化螟获得成功。1974 年又在实验室内连续饲养到第四代。又如氧乐果的合成研究也是如此，吸取兄弟单位的经验教训，敢于知难而上，经过反复实践，摸索出合成的条件和规律，完成了实验室合成路

线及分析方法,为工厂扩大生产和大田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我们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与群众性的科学实验活动相结合,决不是忽视理论研究,而是为了使理论研究建立在更加扎实、更加可靠的基础上。**“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了要在自然界里取得自由,就得不断探索,不断总结经验,从中找出科学的规律性,使自己从必然王国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所以,我们不是不要理论,而是更需要理论,但是理论必须联系实践。因此,我们要求科技人员摆正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认真总结群众实践经验,在搞应用研究时注意摸清规律,坚持在广泛深入实际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努力上升到理性认识,指导实践,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1971年我所科技人员与灭蚁老师傅相结合,在灭蚁实践中筛选出了一种高效灭蚁药物——“灭蚁灵”。以后在各地推广应用实践中,为了弄清在白蚁群体间的传递性能,以及一个群体中的上百万只家白蚁,为什么在巢外施上不到十克的灭蚁灵可导致整巢覆灭的内在作用关系,科技人员继续走出去搞“三结合”,开展灭蚁灵传毒关系的研究。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初步摸清了它的毒理作用、传递距离及其在蚁群间的传递关系。开创了巢外灭治家白蚁的新途径,收到了很好效果,改变了以往采用找巢—破巢—灭治的办法。

应用课题可以“三结合”开门研究,理论课题能不能“三结合”开门研究呢?我所有一个从事苍蝇分类的研究人员,过去自己很少走出去,坐在实验室,打开全国地图,叫助手今年跑这里,明年到那里,到处采标本,以及借用兄弟单位的一些标本或材料,他自己整整关门坐了几年,写出了一本四十万字的苍蝇分类手册。文化大革命后,他认识到自己是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执行者,也是受害者。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通过对孔老二“上智下愚”的批判,他主动打报告要求去青海省从事为害农业作物的花蝇科调查研究。到了当地以后,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组织起一个“三结合”调查小组,花了两个月时间,收获很大,且对花绳的研究有了新的认识。回来后,他深有体会地说:“昆虫分类完全可以实行‘三结合’,当地群众对本地情况最了解,什么时候哪种花蝇多,怎样为害农作物等都能讲出科学道理。‘开门办所’能多快好省,‘关门研究’只会少慢差费”。

“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的这些工作,都是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进行的。只有把路线搞对头,才能把科研促上去。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我们决心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破资产阶级法权,立共产主义新风,继续努力,不断前进,争取为农业增产和“普及大寨县”作出更大的贡献。

INTEGRATE OURSELVES WITH THE MASSES AND WORK FOR AGRICULTURE

SHANGHAI ENTOMOLOGICAL INSTITUTE

This paper gives an account of the coırse taken by Shanghai Entomological Institute through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movement to criticize Lin Piao and Confucius, taking the Party's basic line as the key link, conscientiously studying the theory of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criticizing the revisionist road in scientific work and adhering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taking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and industry as the leading factor in developing the national economy to achieve some brilliant successes in researches. We realize that the political line in scientific researches is ultimately linked with the question "For whom the work is done?" Conclusions were drawn after scrutinizing our experiences since 1958 through line analysis so as to promote revolutionization in thoughts of the personnel. Arrangements were made to allow the leading cadres and members of the staff to go the forefronts of the various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n order to get into real contact with the struggle for production and to cultivate class feelings for the labouring people.

We have adopted the following three types of work to gain that end:

1. To post durable stations in the country-sid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local organizations definite tasks of pest ccontrol are carried out as the situations require.

2. Field experiments. When preparation work necessarily being carried out in the laboratories has reached to a certain stage, we go out to combine with the masses to do experiments in the fields.

3. To organize temporary working teams for special purposes. Based on the pest status and the arrangements made by the relevant offices, temporary working teams are organized for special tasks.

While we emphasize to integrate our own work with mass scientific experiments, we never neglect the importance of basic or theoretical studies. This emphasis is made just for the sake to insure our theoretical studies having sound and reliable foundations.